

1613



第二輯

邓县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邓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前 言

《邓县文史资料》第二期现在出版了。

在第一期出版后，许多同志争相阅读，都想知道一些有关邓县的历史。与此同时，又对本书提出很多宝贵意见，足见大家对本书是非常爱护的。我们政协文史委员会对此向大家表示感谢。

现在，《邓县文史资料》第二期同第一期一样，在我县党政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又出版了。出版前我们对稿件仍然严把四关（观点、史实、文字、时限）作了多次研讨，紧张工作了一段时间，才于今天和大家见面。但我们不是一个专业写作班子，大家都是兼职，研讨、修改都是在百忙中挤时间作的，又因我们水平的关系，错误与遗漏，在所难免，仍希同志们多多帮助，俾得及时改正，使本书健康成长。

邓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元月

EA83/15
政协邓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目 录

启蒙(往事漫忆之一)·····	孙 鼎 (1)
邓县历史上的水利工程·····	骆立群 (9)
渭华起义部队在邓县的遭遇·····	李训祥 (32)
朝华夕拾(记我的小学时代)·····	孙晓宇 (39)
樊钟秀与邓县·····	刘西藩 (47)
诱敌中毒·····	徐天增 (51)
我被“伏牛山工作组”逮捕的前前后后·····	宁志沈 (53)
在榆林村的一次战斗·····	李屏华 (56)
邓县人民医院简史·····	姚万绪 (58)
邓县文物古迹分布情况·····	李云生 (64)
邓梨·····	牛金荣 (76)
邓县烤烟始种年分考证·····	杨文录 (80)
河南烤烟始于邓县·····	陈松峰 (82)
邓县最后一个反动统治者——丁叔恒·····	林书运 (87)
登春风楼·····	刘西藩 (102)

启 蒙

(往事漫忆之一)

孙 鼎

我生于一九一八年，家住邓县城西北二十五里光 伟 村（现名和平村）。七岁时跟着三哥（名甲庭，又名浩然）上村塾。入学要拜见先生（塾师），即向先生磕头，这是传统老规矩。学屋就在我家前院，过去养蚕的两间屋子。开有几个窗户，倒也宽敞明亮。一、二十个学生，沿墙倚窗摆放桌凳坐着。早晨上学，主要是朗读、背诵头天的课程。早、午饭后，都得很快到学屋里去，写大字（写仿），然后念书、背书。背书后，先生分组分人给学生上书（教新课）。小学生只念书、背书、认字，不开讲。大学生开讲，先由先生讲，学生听讲后熟读、背诵，然后再到先生面前复讲，让先生纠正。

由于父亲曾在开封上过学堂，他要先生让我读新共和国文：“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以及“大狗叫，小狗跳”。书上有字有画，很吸引人。这些书易懂、易读、好记，开始读书也不觉得有多大困难。其他学生，还是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他们对这些书，会念会背，也可能认得字，但不懂内容意思。如：“关关雉鸣，在河之洲”，他们就不知道是啥意思，只是会念会

背罢了。一次，一个小学生背《三字经》，把“有典谟，有训诰”背成“油卷馍，肉汤泡”，先生火了，一边打他一边说：“你吃的怪美哩！”

学生在私塾里，整天就是写字、念书、背书，机械呆板，生活枯燥。实际是一条无形的绳索，将活泼爱动的儿童束缚在学屋里，和坐牢差不多。因此，学生总盼望先生有事回家，甚至盼望他害病，好多玩几天。

塾师给学生定了好多规矩，除解手外不准离开学屋，而解手只能一个一个地出去，那个学生不回来，这个学生就不得出去。当时的心情：就是在厕所里多待一会也是美的。但是，解手的时间长了，也会受先生申斥的。在村塾里上学，正象宋湘《忆少年》一诗所写：“老屋柴门树打头，青山屋后水门流。受书十日九逃学，恨不先生命放牛”。

塾师体罚学生是家常便饭，也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塾师，还有家长，都认为：学生不用心读书，一打就用心了，学生不会，一打就会了。其实，越打学生越怕，思想越紧张、越拘束。“灵感”打跑了，成个呆子，或者是干脆不来上学，逃之夭夭。这真是什么时代有什么时代的教学形式，什么时代有什么时代的教学方法。

由于匪荒，我家搬到城里去住，从此结束了在村塾的读书生活。

我十一岁那年，就是一九二九年，二姐（香阶）在女校（城隍庙）教书，我和三哥到一小（黄学）上学。三哥上五年级，我上三年级。刚一进城，又上一小，觉得世面真大，学校更是雄伟壮观。校院很宽、房子很多，学生足有二三百人，教师二十多位。有足球场、篮球场。我们三年级的课程

有国语、算术、自然、美术、音乐、体育等。一个老师教一门课，一堂一换，真有意思，从不感到厌烦。一切都是新鲜的，真是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每天上早学我总是起得很早，到学校时大门还未开。不少小同学也和我一样，坐在大门外等开门。大门开了，进入教室，黑古隆东的，也还是坐着玩。但这表明了童年时期对新鲜事物的向往和喜爱。

小学时代，有几位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吴寿青，大高个，四方脸盘，浓眉大眼，走路沉稳有力，讲话声音洪亮，能吸引人。汪琴声，四十来岁，陕西口音，戴着眼镜，对学生循循善诱，和蔼可亲。张建华，豫南口音，年轻精干，外号铁胳膊（因他善于打拳，臂力过人）。还有李子平、宋任远等老师，都深受学生们的敬爱。这些老师在学生中不是可怕、而是可亲，都想接近他们。好象他们身上带有磁铁一样，吸引着学生。

学校的空气很活跃、很自由、很热烈，真是一个蓬勃向上、意气风发的学校。课外时间，校院内一片歌声，都在唱着这些老师教的《打倒列强》、《可怜的秋香》等歌子。每逢星期六下午，不是演新剧，就是讲故事，或举行讲演比赛。记得有一次演《孔雀东南飞》，刘兰芝的遭遇激起了同学们的同情。演刘兰芝的同学在台上哭，看演剧的同学在台下哭。真是台上台下泪相连，一片凄楚之声。这不仅激起了对刘兰芝的同情之心，而且鼓起了同学们向封建势力斗争的勇气。

当时讲演比赛，一是各班自己组织举行，一是各班选人全校进行比赛。一次，我们班推选我参加全校比赛，我要求三哥给我写讲演稿，他不干，要我自己写，这可难住了我。没办

能，只好自己想讲的内容，记在心里。星期六的下午到六年级教室进行比赛，我讲：“上私塾，读四书五经，考秀才、举人，死八死九的。不如上学校，学科学，讲实用，学体育炼身体……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旧世界，铲除黑暗势力……”。每个同学讲完后，都有一位老师评论的，从内容到态度指出优点、缺点。我讲后是王绍泉老师评论的，王老师评论后，张建华老师又上台对我进行表扬，说我讲的内容好、思想新，我心里美滋滋的，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故事会、讲演比赛、演新剧，既使学生受到了革命的教育，也锻炼了学生的口才、胆量、能力。不是读死书，而是活读书，为以后进入社会学得了应有的知识，培养了一定的能力。

汪老师、吴老师有时叫高年级（五、六年级）学生开讨论会（那时五、六年级学生都是十七、八岁，也有二十多岁的，最小的也有十三、四岁）。先在黑板上写出讨论题，晚上可在大成殿前面月台上围到一起讨论。三哥照例要参加，我也跟上去看。讨论会上有些同学说的很带劲，有些也胆小不敢说，不过说着说着都胆大了，有时还争着说。有时发生争论闹起红来，可是也不恼。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不大懂。有一回，他们讨论“人生观”，下来我问三哥啥叫人生观，三哥说：“就是人活着为的啥？”以后，我常想：人活着为的啥呢？

有一部分学生暗中传阅一些书籍，这些书在图书馆是借不到的，同学关系不十分亲密的也是见不到的。三哥经常带这类书籍回家在夜里看，因而我也有机会看到。这类书籍多是毛边书，其中有《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呐

喊》、《狂人日记》、《青光》、《悲惨的世界》……。这些书我有的看不懂，有的也懂得一些。多是说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在黑暗的旧社会里挣扎和斗争。

学校里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东庑下有两间房子是学生自治会的会址。负责人有孙题录、赵振刚等，常在那里的有袁森林、杨应麟、丁家志，还有个不高不矮的孙天恩和我三哥，女学生有孟昭莲。学生自治会设有裁判股、纠察队等。学生自治会什么都管，讲演会、故事会、演新剧、到校外宣传等，都是自治会组织、安排的，有的聘请老师指导。就说纠察队吧，在没上课以前，提前到校在大门口站岗，不准不三不四的人到学校里去，找人会客须经纠察队员去传。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还有纠察队员巡逻，解决同学间的争执、纠纷。学生自治会规定不准教师吸烟，违者每月罚洋一元，有一位教师吸烟被罚，感到羞愧而离开学校。自治会还规定教师不准体罚学生。有些星期日，组织学生到农村宣传：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压迫中国人民；军阀打仗苦害老百姓；官府黑暗敲诈勒索老百姓。学校还办了“平民夜校”，进步的老师去讲话，高年级的大同学去教识字。总起来说，学生自治会的权力很大，管的事很多，学校的事没有他不管的。

这些老师们经常对学生讲话，说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侵略中国。国民党腐败黑暗，勾结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人民。还讲到中国的前途，青年的使命。一次宋老师讲到国家面临危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努力奋起，救国救民……说得声泪俱下，同学们都深受感染。

有一次张建华老师外出了七八天。在这期间，县长边万选带着护兵来学校转了一趟。张老师回校后，在全体学生会上

气愤地讲了一番话：“什么东西，还想伸进学校里来！再来，把他轰出去！”

我们在一小上学，在这个环境中生活，思想是解放的、无拘无束的，是自由的、奋发向上的。我们认为：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旧政府、地主、资本家，都是坏东西，都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这些人当权执政，中国是没有前途的，非打倒这些人不可，非起来革命不可。当时就养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一次，我们几个学生在街上走，对面走来一个当兵的。我们说：“烂丘八，光会欺负老百姓，今天不给他让路”。说着，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去，他只好给我们让路，站在路边斜眼看着我们。那时我认为对旧政府旧官吏只有硬拚，这真是儿童天真的思想。

城内的学校，还有县立初中（在春风阁）、女校（在城隍庙）、几所初级小学。一小的革命教师和各初小的校长、老师来往较多、关系密切。和县中、女校的校长、教师没有来往。当时我二姐在女校教书，总说一小不好，三哥偏说一小好、女校不好，两个人吵起来，我总是帮着三哥和二姐吵。象这样的家庭纠纷，当时是很多的，有的甚至吵得打起来，或互相不说话，谁也不理谁。

深秋时节，五、六年级的同学们的活动和神情，好象有些不寻常，总是三三两两地不断到那些老师屋里去。三哥和我同路回家，却很少说话，脸绷得紧紧的，晚上不断往学里跑。

事情终于发生了，听说他们一伙大学生竟然端了教育局长王进之的烟盘子，还要他每月交罚款两元。又听说他们约会小商小贩打了税局。

有一天上午，五、六年级的同学特别忙碌：有的拿纸，有的刮小竹批，有的在研墨，有的在写。他们没有上课，忙了一晌。下午上堂的时候，全体同学集合，每人发一个小纸旗，都在卷着，交代不让展开。队伍向小东关关帝庙集合，除一小的学生外，还有自治训练班的成人学员，和各初级小学的师生，还有一些小商小贩。就是没有邓中、女校的学生。各校到齐后，六年级同学张万寿上台讲话，他激昂慷慨地说：“边万选是贪官污吏，他敲诈勒索老百姓、压迫老百姓，你们说该不该打倒边万选？”下边的学生一致呼喊：“打倒边万选！”声浪震动整个庙院。张万寿随即宣布出发，大家展开了小旗。自治训练班的学员开路，一小的学生在前，各初级的学生在后，高年级在前，低年级在后。一路小跑，经大十字街拐弯向北，进了砖城，从天主堂对面走过来宁洗古民团的一个手枪班，走在我们队伍的前面，替我们开路。队伍走到丁字口拐弯往西，只见宁洗古勒着武装带，持着小手枪，站在铁扎山小庙前面，好象是在给我们助威。我们跑到县政府八字门外，大同学们早已冲了进去，有几个拐回来边走边说：“边万选翻院墙跑了，他们追去了，咱们到警察局去找宋××。”说着就从经古楼下钻过去，顺着布袋街直奔警察局。这时队伍也乱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向前冲。当我们跑到文庙街时，只见大同学们已把警察局长宋××揪出来了。这时已是下半后晌了，一个同学喊着说：“咱们胜利了，今天放学回家，明天早点来上学”。这时我才觉得又累又饿，可是心里很高兴，从来没有过的高兴。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我们向旧社会发动了进攻：触动了教育局长王进之，打了税局，最后打了县长边万选、警察局

长宋××。这一学期没有上多少正课，可是我们学到的知识、受到的锻炼，却比上课多得无法计算。

有一次，三哥对我说：汪老师走了，许多年龄大的同学送他送到大东门外，又送过湍河到七里店。汪老师勉励他们，安慰他们，他们深受鼓舞。最后要分手了，他们都哭了。在这前后，吴老师、李老师和其他几位湖北老师都走了，我们心里很不舒服。不过，学校还有张老师、马老师，同学们也没有散劲。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是按部就班在上课。这一学期，我住宿在大成殿。农历四月初四夜里，我被吵嚷的人声惊醒，只见一群人提着马灯在校院里，从这个屋子走到那个屋子。最后，这些人带着张万寿，叫他在院子里到处喊：“孙题录！孙题录！”随后，这些人离开了学校。

农历五月初五（就是端午节）的早晨，我们才知道抓走的同学有张万寿、赵振刚、袁森林、杨应麟、丁家志，还有马云亭老师。在吃早饭的时候，我问三哥：“张建华老师呢？”三哥微微一笑说：“他们抓不住！”

早饭后不约而同的，我们这些十二、三岁小同学，含着眼泪带着鸡蛋粽子，到监狱里去看被捕的大同学和马老师。

从此结束了有声有色的、朝气蓬勃的、勇往直前的学校生活，一小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学校。

那时，我时常想起那些敬爱的老师：身躯高大的呈老师，和蔼可亲的汪老师，精明强干的张老师，还有那些湖北老师，你们都到那里去了呢？真使人思念！

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怀念那些敬爱的老师，向往那一段朝气蓬勃的学校生活。

一九八五年元月十日

邓县历史上的水利工程

骆 立 群

邓县历史上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地区。农田水利灌溉事业，早在两汉时代已经相当发达。西汉元帝建昭间（公元前38—前34年），南阳太守召信臣于穰县造六门、钳卢等陂、堰，凡三十有一处，广灌溉，人获其利，蓄积有余。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至十四年（公元31—38年），杜诗为南阳太守，踵召信臣遗迹，造水排，铸农器，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民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以颂二人之德惠。此后，代有兴修，而宋、明为高潮。西晋有杜预，南朝宋有刘秀之，宋有张永德、谢绛等。尤以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农田水利法为五大新法之一。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即诏诸路兴水利，次年又颁“农田水利约束法”。至元有杨珍，明有赵侯、萧用谦、寇义（寇準后裔）、孔显、张定、程鹏、王道行、潘庭楠等多人，将召、杜堰陂三十有一处，发展到八十七处，清有刘曰章、赵德等人。这些人兴修水利之业绩载于史册志书。及至邓县解放前几年，仍有土山渠、揣意渠等之兴修，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是为了巩固其统治，经济上，扣发省发贷款、搜刮民财、中饱私囊，但毕竟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也给建国以后，发展农田灌溉事业准备了一定的基础。

本文据史志记载就邓县历史上较大的水利工程，如汉井、汉六门堤、钳卢陂、三郎堰，明较大规模地修复陂堰和土山洼排涝，清刁河大堤、得子河改道，民国土山渠、杨公渠、瑞黎堰、湍惠渠等十二项，并附宋京汉大运河一项，共十三项简述于下。

我们考究邓县历史上的水利工程，一是为了说明邓县古有“陆海”之称，搞水利、搞农业大增产，自古以来，就是具有条件，具有一定优势的；二是为了展示与褒扬历来劳动人民的功绩与智慧；三是从中找出整治国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正如《乾隆邓州志》在“水利”部分所云：“邓之陂堰，自昔为盛。……沧桑以后，陵谷变迁，难卒复也。……然则，得古人之意而师之，岂必拘拘往制哉！”

一、汉井

一九五七年邓县文物大普查中，发现汉井六十七眼。汉乐乡城（今陶营乡高李、马场村一带）、冠军城（今张村乡冠军村）、山都城（今构林乡古村）、涅阳城（今粮东镇）等古城遗址内均有发现。在县文化馆文物展览室存放有冠军的汉井圈，有山都城出土的井砖，还有元庄乡出土汉墓陪葬品陶井模型等。

今夏集乡岗上村与杨策店一带，传说是汉羊册故城遗址，有汉井群。据梅振泉同志反映那里的老年人说，汉井以往很多，密度几乎不超过十亩即有一眼。现在还有十几眼，但有水的仅三眼。过去水量小，仅够人吃畜饮。建国后有了机井，人就不吃这些老井的水，老井水仅用以洗菜饮牲口。

这种老井（汉井），井口直径有两种，一是七十公分，一是一米的口径。结构也有两种，一是井砖砌起的，一是陶筒掣起的。汉井砖长五十公分，宽二十五公分，厚四公分（山都城出土的井砖，弧形，长三十公分，宽十五公分，厚十公分，每砖两头带有凸凹榫）。井砖和井筒均有菱形绳纹饰。

一九五九年《邓县新志》载：“杨册城故址。通过一九五七年普查证实，汉杨册城在今城北夏集乡杨册店村，发现有灰土层、绳纹陶片等。”杨册应为羊册，现在水利地图上又写为杨策店，群众叫马武城。

据与老年人座谈了解，羊册城范围之大，相当于今之邓县县城。以羊册店为中心，程集村有个红堂是当时羊册城的北门，元通寺是东门，岗上村西边有个小庄叫赵集是南门，邓营旁边有个三宫殿是西门。汉井群分布在羊册城范围之内。羊册古城址东南郭不远，就是夏集乡的苏营村，一九五七年文物大普查发现这里是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汉羊册城在《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上不见记载，值得进一步查考。

二、汉六门堤

汉南阳太守召信臣创修。是邓县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工程早已湮废，遗址在今邓县县城西三里湍河右岸城郊乡的韩洼村。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竖有文物保护碑一通。

《汉书·沟洫志》载：“岂久历宣、元之世，不易其任，故能成其功也。”可知，召信臣从西汉宣帝时任南阳太

守，开始创修，到元帝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建成。

召信臣开始修此一工程时，先修堤，原是为障防湍水泛滥，及后，“筑三石门，壅遏湍水，引水灌田。”至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乃“更开三石门为六石门。”故人以其为堤，以障湍水之决，而称六门堤；以其以石壅遏湍水，而称六门陂或六门堰（堰者，以土或石障水也），以其可引水灌田而称六门堰。

查《汉书·召信臣传》，召信臣在筑三石门，壅断湍水，引水灌田以后，即元帝建昭五年的次年（元帝竟宁一年，公元前33年），就被征为少府，列于九卿，离开南阳做京官去了。那末，三十八年以后，于汉平帝时，是谁“更开三石门为六石门”？有待进一步考证。

六门堰堰下设水渠一条。引水渠渠线向南到现在的城郊乡三岔院，渐折向东，走三里桥西南，经张寨北，至八里王西，到白落乡薛窑村老虎桥，东走桑庄乡尹集村，经湖堰、砖桥，以至今西棘阳城遗址南，进入新野县，废水于新野县刘庵村泄入白河。引水渠自三岔院以下至新野入白河口一段。据说，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和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曹操和杨坚先后在此渠线的基础上，曾开浚为运粮河。

六门堰引水渠下结二十九陂堰，即现今“长藤结瓜”式，向二十九个库、塘、灌区供水灌田，所以，六门堰也可称之为“堰陂群体”。二十九陂堰中包括当时新野县之樊氏陂在内，最大的陂为朝阳县之钳卢陂，水面为九十三顷八十六亩。

《乾隆邓州志》称：“六门堰溉粮，新野、昆阳三县地

五千余顷。”《嘉靖邓州志》谓：“六门堤均水灌田至四万余顷。”昆阳为叶县，此处所称“昆阳”，当为朝阳之误。朝阳县南紧邻山都县，从地势来看，朝阳县之钳卢陂主要灌区应是向东向南效益山都县土地为多。故六门堰应是灌溉粮、新野、朝阳、山都四县地。六门堰灌区，北起六门堰首，东不过揣，南不过漕，西上不过刁，下不过岗（柳峰岗），整个灌区面积不是太大。又，以今看古，当时县小，虽粮、新野、朝阳、山都四县土地面积总合也不会达到四万余顷（约合今天的一百二十万亩左右）。故六门堰灌溉效益面积应以《乾隆邓州志》所称“五千余顷”为是。

六门堰引水渠从什么地方分支？在什么地方引水过刁河？如何过刁河以灌溉朝阳、山都两县在刁河以南的土地？《邓县地名资料选辑》在《“六门堰”古水利工程概况》一文中称，在王堂村西北侧引水过刁河，解放后，还发现有炭化木桩。其它未详，有待进一步考证。

东汉汲县人杜诗，建武七年（公元31年）出任南阳太守时，踵召信臣遗迹，整修六门堤，在“召堤”之外，增筑新堤，人称“杜堤”，并修治陂池，人获其利。

此工程于汉末毁废，至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镇南大将军、当阳县侯杜预复修，利加于民，时人又号曰“杜父”。太康五年，其部曲主安阳亭侯邓达等人于六门侧立有石碑刻记其事（见《晋书·杜预传》）。此后又复废不修。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南朝宋时修复汉六门堰（在河南邓县西），溉田三万亩。”查《南史》与《宋书》载，南朝宋孝武帝刘骏镇襄阳时（公元445—448

年)，因粮西六门堰，良田数千顷，堰久决坏，公私废业，乃遣抚军录事参军刘秀之修复之，灌区由是大丰。后复废，直至“宋知州谢绛复壅湍水，注钳卢陂溉田，兼障湍水泛滥之害。今陂堰俱废，直谓之‘六门堤’矣！”（语见《乾隆邓州志》）。

在近两千年前建成这样规模的水利工程，确是一项伟大的功绩。《中国水利史稿》称其与战国时期秦之都江堰、魏之引漳灌邺工程媲美，实不为过。《邓县地名资料选辑》说今日六门堤“长堤故址，至今犹存，可供国内外广大考古学者和治水之士参观、考研”。

三、汉钳卢陂

《南都赋》：“陂泽有钳卢”是也。《嘉靖邓州志》载，召、杜在邓为陂、堰三十有一。钳卢是其中最大之陂。也是六门堰下接二十九陂、堰之最大之陂。如《邓县地名资料选辑》所述，因该陂其形如钳似卢（卢呈“L”型，饭器也），故名。志书称又名迪陂。但不是狄陂，狄陂在钳卢陂之东，刘集乡厚桥之南，由白龙渠注之。

钳卢陂位于汉朝阳县境，今邓县城东南刘集乡王堤村西南，北起王堤村，南至今构林乡岗岔楼村一带，即在汉山都城与朝阳城之间。召信臣修成之时，原由六门堰引水，于王堂村过刁河灌陂，水旺，陂南北堤长八里，东西堤三里，总积水面积九十三顷八十六亩。当其时，可东向与南向效益古朝阳与山都两县之地“三万八千亩”（见《邓县地名资料选辑》）。汉末六门堰与其下接二十九陂、堰之引水渠，时久